

■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己酉重印

译注 黄中业 陈思林

审阅 许嘉璐

论衡选译

古代
著述译丛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墨子
选译

责任编辑：黄小石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插图：小 军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墨 子 选 译

刘继华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6.5

字数90 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000册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 元(50种)

译注

刘继华

审阅

董治安

已酉年

一九九〇年·成都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程。但

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

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

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墨子，名翟，鲁国人。他的生卒年不能确考，大约生于公元前479年，死于公元前403年左右。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

墨子做过工匠，长于机械制造。他承认自己是“贱人”。但从墨子一生的活动看，他属于“士”这个阶层，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早年在鲁国曾受过儒家的教育，是个很博学的人。他发觉儒家非常强调礼乐，主张厚葬久丧，不利于人民，违背古代圣王之道，于是他就反对儒家。后来创立了自己的学派。他用上说下教的方法向当时的国君诸侯进行宣传，希望国君诸侯采纳他的意见。他自己就说过：我认为诵读先王的书，通晓圣人的话，就可以上说国君诸侯，下劝平民百姓。国君诸侯采纳了我

的意见，国家就必然会安定；平民百姓听了我的劝告，德行就必然会纯洁。所以在墨子看来，他是宣传先王之道的。但是他勤读先王的书，周游列国，国君诸侯都不采纳他的意见，他也就没有机会称卿作相了。有一次他到卫国去，车上装了很多的书，弟子觉得奇怪，问为什么在车上装很多书？他说，以前周公旦辅佐天子，早上尚且读书百篇。现在我上面没有国君授予的重任，下面不象庄稼汉那样困苦，怎么能抛弃这些书呢？由此看来，墨子既不是统治人民的统治者，也不是直接参加农耕的劳动者。司马迁说墨子做过宋国的大夫，但《墨子》里一点反映也没有，既没有墨子做官的事迹，也没有墨子与宋君的对话。所以有人对司马迁的说法表示怀疑，是有道理的。

墨家学派是怎样产生的呢？春秋战国之际，是列国兼并时期，当时大小诸侯国很多，各霸一方，不断进行战争，加以统治者奢侈享乐，残酷地剥削人民，致使国家混乱、人民困苦。随着地主阶级的兴起，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同阶级出身的士，纷纷要求参与政治。各国的国君也都礼贤下士，招揽人才，作为助手。因此士的阶层逐步扩大，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各种学派也就相续产生了。墨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那时墨家的弟子遍天下，他们大多来自社会下层，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如果不能刻苦，就不配作为墨家的一员。墨家学派，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墨子推荐弟子出去做官，如果有谁做官后违背了墨家的主张，就要被召回。做官得到的俸禄，一定要分一部分给墨家团体使用。墨子死后，墨家的领导者被称为“巨子”，所有墨家的成员都要服从巨子的指挥。后来墨家分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他们都读《墨经》。

《墨子》这部古典名著，就是由墨子及其弟子著述的。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有七十一篇。到了宋代，《墨子》就只有六十一篇了。现在的《墨子》，只剩下五十三篇了。这是我们现在研究墨子思想及墨家学说的宝贵资料。

现存的《墨子》，总的说来，是一部墨学丛书，它可分为两大部分：《备城门》以前的各篇算一部分，它是墨子及其弟子论政治、经济、科学、逻辑等方面的言论；从《备城门》起，以下的各篇算一部分，是墨子及其弟子论守城之法的言论。这后一部分，在汉代，可以分出来单独成书，也叫《墨子》，刘歆的《七略》把它归入“兵技巧家”。

《墨子》这部书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

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是墨子针对当时诸侯各国的情况提出的主张，可以说是墨学的纲领。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主要材料。原来在每个题目下，都有上、中、下三篇，内容大同小异。这很可能是由于墨家后来分成三派，各派弟子所作的记录有详略的不同。书中从《经》上到《小取》，即所谓墨经、墨辩。它的内容，不仅包括政治、伦理、经济、教育、认识论、逻辑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包括中国最早的关于数学、光学、力学方面的知识。这部分没有宗教迷信思想，学术价值很高。

墨子的思想学说，有很多方面值得研究。例如：

在政治方面，墨子主张尚贤，他认为：尚贤是政治的根本。他反复抨击“骨肉之亲，无故富贵”的旧制度，提出了“官无常贵，而民无常贱”的新原则。墨子认为，只要有贤能，不管亲疏远近、贫富贵贱，都要任用他。即使是务农做工的人，有贤能就要提拔他。如果是无德无才的人，即使是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也要把他撤下去，使他贫贱。墨子的这种主张反映了自由平民和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对立，是有进步意义的。

墨子认为，只有天下的人都兼相爱，才能安

定，如果交相恨就会混乱。他把能不能兼相爱看成决定社会安定不安定的唯一条件。墨子从兼爱观点出发，主张“兼”，反对“别”。他说的“兼”，就是爱别人象爱自己一样。他把合乎这个原则的君叫做“兼君”，合乎这个原则的士叫做“兼士”。他说的“别”，就是把自己与别人区别看待，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墨子把这样的君叫做“别君”，把这样的士叫做“别士”。“别君”、“别士”是墨子所反对的。由于墨子不了解社会治乱的根源，他要大家都来“兼相爱、交相利”，根本不可能，只是一种善良的幻想。

墨子主张“非攻” 这同他的“兼爱”是一致的。他认为大国攻小国的兼并战争是不义的，是亏人自利的盗窃行径，所以主张“非攻”。在他看来，这种兼并战争产生的根源，都是由于不相爱引起的。从当时历史发展的道路来看，这种兼并战争是由分散割据走向统一的必然方向。墨子当时不可能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也不可能认识战争的社会根源，因而他不能科学地区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性质。但他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在经济方面，墨子主张“强本节用”。所谓“强本”，就是增加农业生产；所谓“节用”，就

是限制王公大人的奢侈浪费。在《节用》、《节葬》等篇中，墨子反复阐述了这一思想。墨子的这一思想，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

在军事方面，墨子善守御，他的战略思想，他的守城之法，很值得研究。墨子主张有备无患，认为准备工作对于保卫国家的安全至为重要。不仅城防、兵器、粮草要作准备，思想上也要作好准备，要上下一心；另外，外交上要“遍礼四邻诸侯”，政治上要“悦忠行义”，都要为防御作准备。墨子在回答弟子禽滑釐问如何守城时就说过：守城的根本在于要修好城墙、护城河，防御器械完备，粮草充足，官民上下一致，并能得到四邻诸侯的援助，同时还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守将要有才能，二是国君要信任他。可见墨子的守御，不是单纯的军事守御，他是把军事跟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都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战备思想体系。

在认识论方面，墨子在《非命》中明确提出：“言必有三表（即三法）”。他说的“三表”就是：一要考察古代圣王的经验，二要考察百姓耳闻目睹的实情，三要从政治实施中考察它是否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用这三表作为判断真假是非的标准。这可见墨子是根据经验和客观效果来判断事物的真假是非。他反对主观，相信客观。他的认识论

是唯物的经验论的认识论。但在《天志》、《明鬼》、《尚同》等篇中又主张尊天事鬼、上同于天等等，则是他唯心主义的宗教迷信思想的反映。

综上所述，从墨子的全部思想看，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保守的一面，而前者是主要的，所以他不愧为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墨子》这部书，不愧为古代文化的名著。但是汉兴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贬斥，《墨子》一书，两千多年，几乎没有人传述。清代以前没有校本，讹误衍脱，比比皆是，所以《墨子》在诸子中是最难读的。今传注本，以清代毕沅注本为最早，以孙诒让注本为最善。此后有吴毓江校注本，所用校勘的版本较多，其中有十五种善本是孙诒让没有见到的。此外各家校勘校释，也各有所长。我们在选译《墨子》时，广参各家校注，择善而从，或据以对原文作了必要的校改，或在释文中利用了有关的学术成果，为了通俗易读，注解中没有一一标明。

墨子文章的特点 意思明显，语言质朴。我们的翻译，按照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原则，力求做到准确流畅、合乎规范，不失原文的特点。

本书曾受到研究所领导的热情关怀，并在多方面得到徐适端、侯昌吉、冯昌敏老师和研究生顾之川、吴泽顺、吴福祥同志的帮助，最后承蒙李运益

教授审阅了全稿，在此一并致谢。

限于水平，书中的错误，一定不少，敬希指正。

刘 继 华

1987年2月于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研究所